

张舜徽著

顧亭林學記

卷之三

顧亭林學記



張舜徽著

顧亭林學記

中華書局

顾亭林学记

张舜徽著

*,

中华书局出版

(北京复兴门外翠微路2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出字第17号

北京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全国新华书店经售

*

850*1168毫米1/32·3 3/4印张·75,000字

1963年12月第1版

1963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3,350 定价: (7) 0.42元

统一书号: 11018·500 63.11. 京型

序 言

古代学者当中，很有些继往开来的人物。明清之际的大学者顾亭林(炎武)，便是被经常称举的一个。

有人怀疑到顾氏著述既以“音学五书”为最专精，应该肯定他是一位杰出的音韵学家，为什么后人谈到清代的经学家、史学家、乃至金石学家，都离不开他？他一生专业，究竟是什么？难道每门学问，他都很精通吗？我认为如果要弄清楚这一问题，首先在思想上必须明确两点：第一，古人做学问，有他们的规模次第，不可拿今天的治学范围，去衡量古人；第二，古代学者，又有专家和通人的区别，不可拿专家的尺度，去衡量通人。关于第二点，更有着重说明的必要。

从历史记载中，看过去二千年间的我国学术界，可以肯定从汉初以至清末，学者们做学问的风气，有着两条不同的道路：一是博通的道路，一是专精的道路。专精的道路，在西汉时便是所谓“五经博士”之学。那时当秦火之后，几部重要经典，大部分都残缺不全，由于传授的本子不同，于是解说也就不同。以致“经有数家，家有数说”；“分离乖隔，不合不公”，没有方法可以统一起来。当时所谓专家——五经博士，事实上也非谨守师说，专研究一部书不可。这便替当时学术界带来了两种弊短：一是局隘，二是破碎。所谓局隘，便是此经不通于彼经，此说不通于彼说。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所指出

的“挾恐見破之私意，無從善服義之公心”；班固在《漢書藝文志·六藝略》所說“安其所習，毀所不見，終以自蔽”，都切中了漢代專門經學家的病痛。所謂破碎，便是死板地從文字上作些繁瑣考證。西漢末年學者桓譚，在所著《新論》中說過：“秦近君能說《堯典》篇目，兩字之說，至十餘萬言，但說‘曰若稽古’三萬言。”（見《漢書·藝文志》顏師古注引）這是何等破碎的工夫！他們在治學方面，範圍既如此褊狹，深閉固拒，不肯接受其他的不同議論，對於解釋古書和說明問題，多出於主觀片面，自然免不了歪曲和錯誤，更談不上融會貫通了。

但是在兩漢時期的學術界，象司馬遷、揚雄、劉向、鄭玄這般人，便是走的另一道路——博通的道路。假使司馬遷沒有“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殊語”的本能，怎樣能寫成一部無所不包的“史記”？揚雄、劉向不是學識淵博，怎樣能校定天下群書？（揚雄曾校書天祿閣，見《漢書》本傳）鄭玄沒有融會各家經學的說法，怎樣能溝通古今文、重新替群經作注解？這些人做學問的面本寬，和那般局限於專經研究的五經博士比較起來，知識領域便截然有廣狹之不同，不是儒林傳所能範圍，所以他們在兩《漢書》中，都不列入儒林傳，而另有專傳。後世學者象宋代的鄭樵、朱熹，清初的黃宗羲、王夫之，都是走的這條寬廣的路。顧亭林在清初，和黃、王一樣，是一位博通的學者。

有人認為學貴專精，便在於鑽得深，鑽得透，對某些專門性的問題，確能說明其所以然，指出它的利弊得失，並有所發明或發現，對整個學術來說，是有利的。至於博通的人，雖涉及的面比較廣，究竟還多少嫌其空泛。我以為這種說法，僅看到問題的一方面，而沒有考慮到多方面。首先必須肯定學問博通的學者，由於治學範圍

比較寬，知識領域比較廣，在分析問題時，能由一事物聯系到若干事物，由一種書聯系到若干種書，所以得出的結論，比較通方而無偏蔽。在某些專門研究的工作方面，實際已做了發凡起例、開辟途徑的工夫。替專精的學者們指出了研究方向和下手方法，這功績是不可湮沒的。即以顧亭林為例，他在研究古韻的過程中，不墨守前人成說，居然在宋人鄭庠所分古韻六部的基礎上繼續有所發展，這便激起了後來學者們深入鑽研的興趣，替三百年來音韻學家開了一條路。這一研究工作的能夠深入展開，顧氏確起了承先啟後的巨大作用。其次，如顧氏重視金石考古的工作，也替後來史學工作者啟示了努力的途徑。由此可見，博通與專精，在過去學術界雖是兩條不同的道路，但是彼此並不矛盾，而且是互相依倚，緊密聯系着的。

今日人們做學問，雖不必強調走過去學者博通的路，但是我總覺得必須首先積累多方面的基本知識，才能談得上進行專精研究。假使常識不夠充足，便馬上從事專精研究，隨便哪一門學問，都是講不通的。即以整理祖國文化遺產而言，如果沒有古文字學的基本知識，便去研究銅器和甲骨刻辭；沒有古器物學的基本知識，便去審定真贗，有所考證，都是行不通的。至於學習本國歷史，上下五千年，典籍浩如烟海，牽涉的面太廣，應讀的書太多，假若基礎打得不好，連許多常見書都沒有讀過，便馬上想研究某一朝代的專史，也是徒勞無功的。因為事物總是彼此聯系，不可分割。昔人所謂“牽一髮而全身動”，表現在學術研究中，更為明顯。如果一開始便把範圍弄狹隘了，遭遇的困難必然很多。過去學者們教人治學，特別強調本末、先後、緩急的程序，並且提倡“由博返約”的研究方式，不是沒有理由的。

黃梨洲說的很好：“學問之事，析之者愈精，而逃之者愈巧。”（《留別海昌同學序》）這句話雖說在三百年前，却道破了三百年來學術界的通病！有些局隘的學者，以為自己從事專精研究，凡是不屬於這一專業的知识，我都可以不管。這在十八世紀中葉到十九世紀初期的乾嘉學者們，便已伏下了這一病根。他們既高舉一面“漢學”的旗幟，人人想爭取以專門名家，不自覺地把學問範圍弄窄狹了。當時所引起的流弊，連平日替“漢學”張目的江藩，也忍不住要說幾句話。他在《漢學師承記》中指出：“自惠戴之學，盛行于世，天下學者，但治古經，略涉三史；三史以下，茫然不知，得謂之通儒乎？”又說：“近時學者，喜講六書，孜孜於一字一音。苟問以三代制度，五禮大端，則茫然矣。至於潛心讀史之人，更不能多得也。”（見《漢學師承記》卷三、卷七）這却正確地反映了乾嘉學者們治學的真實情況（當時還是有少數的個別的學者是很博通的）。研究經學的，可以不讀史；甚至研究這部經典的，可以不理會另一部經典；這樣的局隘褊狹，如何推廓得開！在學術上自然引起了不好的影響。這種影響，一直到今天還是有不少的人感受着的。

有些研究工作者，把用功的面，割裂得至細至窄。於是研究先秦史實的，可以不熟悉秦漢以下的世系、大事；研究近代史的，只局限於百年以內史料的搜討。這樣替自己畫定了一個圈子，自然談不到多方聯繫，融會貫通了。我們試尋味黃梨洲在三百年前所說的話，真足以發人深省！

顧亭林和黃梨洲一樣，在學術研究方面，是不主張走窄路的。並且經常喊着“博學于文”的口號，用以自勵，並用以教人。這個“文”字，却包括得很廣泛。除掉一切用文字記載的書籍以外，他在《與友人論學書》中還指出：“自一身以至於天下國家，皆學之事

也。”那么，連平日生活实践中的每一事物，都成为了应该学习的对象，所以他所强调的“博学”，本不限于讀几句死书。这是何等闊大的規模！一个做学問的人，必須有这样的胸襟和气魄，才能推廓得开，不至于像春蚕一般的作茧自縛。

一个人在学术上取得輝煌成就，一方面固决定于有闊大的規模，但更重要的，还在于有惓惓无华，坚毅不拔的治学精神，作持久奋斗。如果没有这种精神，規模虽立得很闊大，也仍然会落空的。顾亭林一生，所以能取得多方面的成就，固然由于能够经常开动脑筋，深入思考，发挥创造性的劳动，对各种学問，都有不少发明或发现。但在他具体进行研究工作的过程中，所采用的方式方法，也还有四个特点：

一、勤动手 表现在一生鈔书的成績，特別惊人。既可帮助记忆，又通过提要鉤玄的办法，成为各种著述的底本。

二、勤动脚 无论在家乡或者旅居北方，总是经常出游。通过实地調查研究，来丰富自己的知识。并且把实际見聞和书本記載紧密地結合起来了。

三、善于支配時間 平居固然沒有一天不讀書，即在长途旅行期中，也还利用騎在馬上的時間，背誦过去讀过的旧书，不使片刻光阴虛度。

四、善于接納朋友 早年在江南，和后来北游期內，都特別注意論学取友，一生交游很广。在做学問方面，得朋友帮助之力也很大。

以上四点，可說是顾亭林一生成功的基本条件。至于他平日老老实实，埋头钻研的态度，不求速化，不慕近功，把做学問看成終身之事，这种恒心毅力，誠属难能可貴。我之所以汲汲写成顾氏学

記，不是沒有深意的。

由于事物总是发展的，进步的。生在二十世紀的今天，即就整理祖国文化遗产，研究历代史实而論，当然不應該停留在顾亭林时代的水平。但是从学术研究的步驟來說，必先痛下苦功，积累知识，掌握丰富的資料，并使之条理化，才能运用馬克思列宁主义的觀點、立場、方法来加以分析和批判。所以我們今天对于前人做學問的一些踏踏实实的态度与合理的工作方法，都應該批判地加以吸收。許多封建学者治学的忠实态度，从句讀开始，一点一滴，积累知识，来打好做學問的基础。他們在这方面，既創造了許多方法和条例，自然不容忽視。只有在这一基础上做好准备工作，再結合着科学的提炼資料和改造資料的手段，运用正确的观点和立場进行分析批判，才能出現新的有用的研究成果，这是很显明的事实。如果始基不立，就很难做出什么成績来。

顾亭林在論学方面，并不是沒有缺点。和其他封建学者一样，为历史条件所限，有些議論主张，不免流入迂闊。不独他所提出的有关经世济民方面的办法，強調“法古用夏”，违背了社会进化的原理；即在討論其他学术性專門問題，也多有“食古不化”的毛病。例如他研究古韵，总算是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他在《音学五书序》中却說：“天之未丧斯文，必有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他居然想把后世語音恢复到三代时的旧讀，这当然是不可能行通的事；这种看法，仍然是从“复古”的思想基础上提出来的。象这一类的見解，人們容易辨识其錯誤，用不着詳加批判，我在写这本學記时，也就不必引入。

至于近人闡述顾氏学术思想的文字中，也有歪曲顾氏原文，以及与顾氏語意不相符合的地方，我也不敢曲从。例如顾氏談到整頓

风俗，经常强调“清議”的作用。他所提出的“清議”二字，明明是指社会（其实主要是士大夫）的正直輿論。所謂“一玷清議，終身不齒”，語意是十分明白的（詳見《日知录》卷十三《清議》条）。近來有人談到這個問題，便肯定它是近代言論自由的“新民”思想。這便把“清議”的“議”，看成議論國家大事了，顯然是和顧氏原意有距離的。象這一類的問題，最好實事求是地用歷史觀點去仔細分析，以古人之見，還之古人，而不失其真。不必拿後起的新名詞、新術語，強加於古人頭上，以致違背了原來的意思。我在撰述這本學記的過程中，就特別注意到這一點，不敢於古人辭意之外，有任何不必要的附加。有些地方，還只得照古人原語介紹出來，留待讀者論斷。

“學記”這一類寫作的出現，發端於清代末年戴望寫的《顏氏學記》。將顏習齋和李恕谷的言論，從遺書中輯錄下來，戴氏本人，幾乎沒有什麼按語和考證，這是一種鈔書的體例。當時《顏李遺書》流傳不廣，人們不易看到他們的議論主張。戴氏本着闡幽表微的意思，將顏李遺言擇要鈔錄一遍，介紹給社會，這在當時，是一件極有意义的工作。後來學者們知道重視顏李之學，大都是從戴氏書中受到啟示的。由此可見，“學記”一類的寫作，對於介紹前人學術，啟辟後人途徑，效用是比較大了。

不過今日撰述“學記”，不必沿襲戴氏那種但事鈔錄，全無論斷的體例。相反地，應該將每一學者治學的方法、態度和精神，以及他的學術淵源、為學次第，作出全面而概括的說明，這對讀者來說，幫助自然很大。我這次撰述顧氏學記，便重視到這一點，將全書分為《綜述》、《分論》、《附記》三大類，每類中又各標小題，分篇闡說。很想通過這一次的整理編次，使有志讀書的青年朋友們，對顧氏學

术,能了解一个輪廓。

张舜徽

一九五七年四月二十五日于武昌

前几年写此书时,本以供初学閱覽,务求浅明易懂,故叙述文字,力避繁冗。今略加修訂,并补写«簡評»一章,以当全书的总结。茲交中华书局重印,借以紀念亭林誕生三百五十周年。

舜徽补記

一九六三年四月七日

目 次

序言	1
綜述	1
一 顾氏身世略述	1
二 顾氏著作簡介	3
三 顾氏学术趋向	9
四 顾氏学术渊源	12
五 顾氏治学的精神	18
六 顾氏治学的态度	21
七 顾氏治学的方法	24
八 顾氏年表	29
分論——顾氏在学术上各方面的成就	34
一 “小学”	34
二 “经学”	42
三 “史学”	52
四 “理学”	62
五 “詞章”	67
六 “经济”	72
簡評——顾氏一生行事和学术总的估价	
附記——顾氏生平論学取友的一斑	86
一 四十五岁以前的江南友好	88
二 四十五岁以后北游时期所結识的朋友	93
三 书札往还、未曾会晤的学者	98
四 相从請益的学生	99

綜 述

一 顧氏身世略述

公元十七世紀，當明清之際的時期，是社會急劇變化的時期。明代末年，滿洲貴族勃興東北，日益強大，有叩關內侵之勢；統治階級腐化無能，賦稅繁重，人民無法活下去。隨著資本主義因素的增長，工商業者反對封建壓迫的鬥爭趨於激化；接着由於土地的高度集中和封建剝削的異常殘酷，而爆發了李自成所領導的空前規模的農民大起義。滿洲貴族便乘機入關，從農民起義軍手中奪取了勝利果實，爬上皇帝的寶座。人民不甘受他們的奴役，在全國範圍內，廣泛展開抗清鬥爭。這時便涌現出不少卓越的政治思想家和活動家，積極參加當時的人民抗清鬥爭，奔走呼號，抱守着“夷夏之防”的思想，積極策劃抗清活動。事雖失敗，始終不肯投降，或者銷聲匿跡，深隱岩壑；或者變易姓名，出遊天下，將他們在書本里鑽研所得和在游歷中考察所得的一些知識，記錄下來，留供後人參考。特別是他們通過親身感受，針對着明末政治上失敗的原因，在法制方面，提出了一些改良辦法和主張，乃成其所謂“經世致用”之學。這樣的學者，在當時並不算少，而顧炎武便是其中最傑出的一个。

顧炎武，初名絳，明亡後易名炎武，字寧人，江蘇昆山人。學者稱亭林先生。生於公元1613年，即明萬曆四十一年；卒於公元

1682年，即清康熙二十一年。他生長在一個官僚地主家庭，祖先們世代做過明朝的官。到他出生時，家道雖漸形衰落，但還保存了一部分藏書。特別是他的嗣祖顧紹芾，是一個關心政治留意時事的書生。顧炎武從十歲時起，便跟着祖父讀書，受過比較嚴格的訓練。祖父規定他每日除誦讀以外，還要鈔書；並指點他注意講求天文、地理、兵、農等實用的學問。暇時又有他的嗣母王氏講述許多歷史上民族英雄的故事來鼓勵他。這些，都對他一生學術的趨向和多方面的成就，以及後來成為忠憤耿耿始終保全民族氣節的人物，無疑是有很大影響的。

後來他的年紀漸漸大了，開始與社會接觸。恰逢其時，一般士大夫繼“東林”之後，又組織了“復社”，他便參加了這一政治性的學術團體，廣泛地和當時許多名士往來，講學論道，抵掌談天下事。他把科場應試看成無足輕重，進一步努力鑽研實用之學；於是發憤讀《二十一史》、《大明一統志》及各府州縣的方志。他經常自己慨嘆道：“感四國之多虞，耻經生之寡術。”（《天下郡國利病書》序）這兩句話，卻吐露了他講求实學的志趣。從二十七歲起，便開始博綜群書，搜集明代以前中國的經濟狀況和自然環境方面的材料。舉凡有關農田、水利、礦產、交通的記載，無不勤加鈔撮。這不獨替後來寫成《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準備了豐富的資料；同時也奠定了他一生學問的雄厚基礎。

當公元1644年清兵入關時，顧氏年才三十二歲。明年五月，清兵渡過長江，大肆屠殺。他前後勇敢地參加了蘇州起義和保衛昆山的戰鬥。兩度抗清失敗之後，故鄉不易立足了，便忍飢耐寒，過着流浪的生活。最使他痛心的，便是他的嗣母王氏，當家鄉淪陷之時，絕食十多天以身殉國，臨死時，給顧氏留下“無為異國臣子，無

負世世國恩”的遺囑。這更堅定了他的民族氣節，一生在詩文中經常引他母親的遺囑來鼓勵自己。後來，清代統治者雖想盡方法來網羅他，他始終堅決拒絕征召，不是沒有原因的。

顧氏當國破家亡之後，決計離開江南，作長期而大規模的出游，一則想結納英雄豪傑，二則想考覽山川形勢。他的隱情，仍然想汲汲鳩合同志，圖謀天下大事，和一般泛泛的旅行家，截然不同。1657年，當他四十五歲的時候，開始向山東出發。臨行前，特地走到南京鍾山之麓，拜謁明太祖的墳墓——明孝陵，然後踏上征途。他的眷戀故國之情，可以想見。到了山東以後，又時時往來山東、河北一帶。特別對於河北省的許多形勝之地，如山海關、居庸關、古北口、昌平、薊州、昌黎等處，都做了一些實際調查的工作，並多次哭吊於昌平的明“十三陵”。後來又遍遊山西、陝西和河南三省的一些主要地區，並擇冲要之處，從事垦荒，最後定居在陝西的華陰。他認為華陰形勢很好，退可以守，進可以取，大可經營一番，於是置田五十畝以自給。後來他的外甥徐乾學（官至尚書）、徐元文（官至宰相），在清初做了大官，替他買田置宅，多次請他回江南終老，顧氏卻始終不肯南歸。1681年（康熙二十年），從華陰出游河東，復至曲沃，明年正月，死在曲沃韓姓家，年七十歲。

二 顧氏著作簡介

顧氏一生喜好讀書，他除了在少年時努力钻研，把古代經典和子史群書作了一番深究以外，後來在長期旅途中，也沒有一天不讀書。他的旅行，照例用兩匹馬換着騎，兩匹驢馱着書跟在後面。到了險要的地方，便找些老兵退卒，問他們長短曲折。倘若和以前所

聞不合，便找一休息的地方，打開書對勘。倘若經行名山、巨鎮、古寺、頽垣，便探尋殘碑遺碣，拂拭玩讀，鈔錄大要。他的著作，大部分資料是從實地勘察中得來的，和一般閉門造車的學者，絕然不同。他一生得完成幾十種的寫作，不是偶然的。其中大部分，已被收入《四庫全書》。現在將已刊、未刊諸書，分列如下：

《左傳杜解補正》三卷 是書博考典籍，以補正杜預《左傳集解》的闕失。《四庫全書》入經部春秋類。《亭林遺書》本。《皇清經解》本。

《九經誤字》一卷 是書根據石經及各種舊刻，以勘正監本和坊間刻本的誤字。《四庫全書》入五經總義類。《亭林遺書》本。《皇清經解續編》本。

《音學五書》三十八卷 是書包含五種：一、《音論》三卷；二、《詩本音》十卷；三、《易音》三卷；四、《唐韻正》二十卷；五、《古音表》二卷。《四庫全書》入經部小學類。張弼寫刻本。蘇州繙刻本。光緒乙酉四明觀稼樓重刊巾箱本。湖南思賢書局本。

《韻補正》一卷 是書訂正宋吳棫《韻補》中關於古音叶讀的錯誤和今韻通用的失當。《四庫全書》入經部小學類。《亭林遺書》本。《連筠蓀叢書》本。

《顧氏譜系考》一卷 是書辨得姓之本，以及吳郡顧氏的世系。《四庫全書》入史部傳記類存目。《亭林遺書》本。

《歷代帝王宅京記》二十卷 是書所錄為歷代建都之制。前二卷為總論，後十八卷詳載城郭、宮室、都邑、寺觀等建置的本末。《四庫全書》入史部地理類。《碧琳琅館叢書》本。《亭林遺書彙輯》本。